



试析国际秩序的转型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树立

蔡 亮

〔内容摘要〕 传统国际秩序的本质是将建立在西方这一“地方性”的政治经验和价值判断等推广至全球,构筑由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格局。然而,随着西方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数百年来形成的政治经济旧逻辑越来越无法与新格局相适应,国际秩序的转型成为历史必然。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提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中国方案”也就具有了时代必要性。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不是要输出中国模式或让中国取代西方,而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为目标。它强调全球治理在认可价值多元和价值平等的基础上,坚持“多元共生、包容共进”,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换言之,中国全球治理观绝非中国一家上演的独奏曲,寻求的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积极推动各方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参与者、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获益者。

〔关键词〕 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逐渐确立了在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优势,将整个人类社会纳入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去。西方将本是建立在西方这一“地方性”的政治经验和价值判断理所当然地视为应予推广至全球的所谓“普世价值”,最终构筑了由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格局。

然而,随着西方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西方数百年来形成的政治经济旧逻辑已经无法解决逐渐增多的新难题,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也未能反映新格局,代





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①其结果导致治理赤字日益凸显,国际秩序的转型成为历史必然。与此同时,客观上国际社会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中国站出来勇担责任,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与建设者,也愿意拿出中国方案,为塑造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②中国方案所体现的中国智慧应是从根本上塑造一种区别于传统国际秩序的新理念,即中国在向世界贡献中国力量——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彰显出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内核的全球治理观。^③而唯有树立了这一新理念,国际秩序的转型才被赋予了内在、本质的意涵。

一、国际秩序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国际秩序形成于民族国家产生之后,意指在一个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各种保障机制。相比之下,全球治理理念的出现是人类生产与社会活动发展到全球化阶段的产物,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核心表现,两者可谓互为表里。它指的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权衡各自利益,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而建立的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规则或机制的总和。^④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主权国家理念日益成熟,在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之后,几百年间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虽然依旧,国际纷争依旧频仍,但国际秩序还是在艰难中不断演进。它主要体现为各种国际机制、行为规则的不断完善和人类思想意识的日益进步,并最终形成了主权平等、利益至上、国际法治、大国引领和尊重人权等一系列现代性的理念原则。^⑤上述理念原则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内涵,还为全球治理创设了一系列价值基准,如主权平等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基础,由主权平等衍生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合作、国际责任及国际规则等分别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实现途径、核心内容及表现形式等。

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构筑和推进的基本模式离不开某个或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9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

④ 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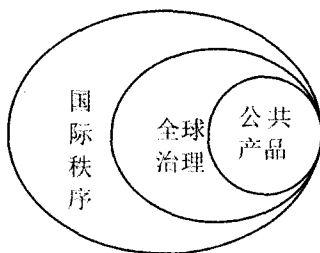
⑤ 王鸿刚:《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与中国的时代责任》,《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第1页;王鸿刚:《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时代的机遇与方向》,《外交评论》2017年第6期,第2页。



几个世界大国的主导。众所周知,现阶段的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建立的,对国际政治、经济等事务进行管理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在政治层面上,它认为以自由主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理念具有“普世性”,因而强调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以开放、民主、个人人权为核心特征的自由国际秩序,而在经济层面上则意图实现市场经济的全球化。^① 以此为基础,迄今为止支撑全球治理运行的基础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②

金德尔伯格研究指出,国际公共产品意指维护和平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包括公海航行自由、清晰界定产权、国际货币和固定汇率等公共产品需求,及由此形成的超国家层面的国际宏观管理机制,包括国际上具有充分共识的原则、准则和决策程序等等。^③

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及公共产品的关系示意



众所周知,传统的国际秩序偏好渲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等由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全球治理模式。^④ 而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国际权力结构出现了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这两大特征。^⑤ 以此为背景,全球治理的传统模式日显捉襟见肘。

具体而言,西方国家习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希冀依赖一条民主化全球治

① Robin Niblett, “Liberalism in Retreat: The Demise of a Dream,” *Foreign Affairs*, Vol. 111,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7, p. 17.

② Fronk Biermann et al,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9, No. 4, 2009, p. 1440.

③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1986, p. 113.

④ 蔡昉:《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全球公共品及其提供方式和方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4页。

⑤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p. xv.



理路径,认为稳定的自由与民主制度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① 因此,其在推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倾向于运用所谓普世性规则和价值观来梳理利益纠葛,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时偏好奉行干预方针,甚至有“全球治理和干预主义常被认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②之说。全球治理也因此越来越沦为西方国家“治理全球”的工具。而这种“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结果是治丝益棼,不但给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持续的动荡和混乱,也殃及西方国家自身,还导致全球治理制度和规则碎片化并陷入能力不足的困境。

从应然的视角而言,西方国家应就此改弦更张,从源头上对全球治理理念加以调整。然而,它们却囿于国内短视的选举政治操作,越来越将“独善其身”视为政策首选,参与全球治理的步骤和投入不断下降。这又使得全球治理的国际领导赤字问题浮出水面,而特朗普总统基于“美国优先”原则而实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则让这种赤字问题更加凸显。可以说,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深陷理论和实践困境,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面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呈现出越来越脱离现实需求的倾向,加速推进国际秩序的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经成为现实而迫切的课题,具有历史必然性。

凡此种意味着既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已处于换挡期,需要升级换代成符合时代需求的 2.0 版。2.0 版不是新瓶装旧酒,只有提供新的思想、选择、路径和方案,才能有效解决西方国家内部治理困境、全球公共产品匮乏、全球共同利益与国别利益错配等一系列难题,才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肆虐、能源和食品安全危机、传染性疾病跨境蔓延等因全球治理议题泛化而出现的非传统威胁外溢问题。毋庸置疑,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已成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力量,一直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随着中国从全球性大国正逐步迈向全球性强国,其政策取向与未来战略走向的受瞩目程度也是与日俱增,这也使其肩负着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大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国际责任。

① Iver B. Neumann and Ole Jacob Sending, *Governing the Global Polit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0, p. 6.

② 石之瑜、皮查蒙·约范童:《中国式不干预主义——治、治理性与全球治理》,《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第 5 页。



二、中国全球治理观的目标与意涵

睽诸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为从融入国际社会到变革国内社会再到树立新理念的过程。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并顺应时代之需,积极作为、勇于担当,在反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展现大国责任,推进国际秩序的合理变革,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为实质性地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的5年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视和参与程度达到了历史新高,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愈发凸显。与此同时,中国明白无误地将自身全球治理观的目标诉求呈现给国际社会。

概言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①为终极价值目标。为此,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治理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②

所谓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若“谋而无道”,势必“其行不远”,“行稳致远”的背后需要有价值理念支撑。如前所述,中国全球治理观的价值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其蕴含的价值理念是“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强调的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切实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它把发展放在首位,注重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与发展,强调构筑体现公平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体而言,中国认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控,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并塑造共同未来。此外,它指出全球治理要实事求是,而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将自身利益与别国利益结合,合作共赢,如此才能避免孤芳自赏地上演独奏曲,而构成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实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多元共生反映的是在多元主体间的共存互动、互补相促而产生事物生生不息的动力和生机。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共生有别于“有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60页。



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对抗式、零和性冷战思维,也不同于赢者通吃、互害的实践模式。^①

后者强调二元对立,习惯用“我”(One)和“他者”(the Other)对立的二分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元对立的实质是一元论,说到底就是要把“他者”的“非我性”按照自我意愿改造为“我”或与“我”同。在实践中,这难免要经历一个“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他们视而不见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的现实,包括历史的多样、文化的多样、社会形态的多样,而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某种整齐划一的、终极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化模板。这种一元论的价值认知从根本上背离了世界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因此不是别的而正是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它的谬误。事实也已证明,在多样化国内制度并存的国际关系中,期待国内制度的趋同、以一种国内制度作为参照来改造他国制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国际合作的难题只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它不仅是导致国际社会战争和冲突难以消弭的根源,也导致很多国家出现“民乱”(democracy),其结果必定是消弭人类社会各种蓬勃的生机和创造力。

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与之相应,人类的价值追求也是多元的。用价值多元的理念来看待世界和世界秩序,人们将摆脱一元论的思想束缚,不以“他者”的消失为前提统一为“自我”,而以不同事物的相生相长为根本和依归。进一步地,在尊重多元价值基础的前提下,又让我们在观察世界和处理世界事务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价值平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为实现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前提。

所谓价值平等,简言之就是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化和文明,“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②它要求人类不同社群的多种价值选择应得到同等的尊重,任何一种价值都不能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换言之,任何人都没有掌握绝对真理,任何人都无权俯视地、居高临下地看待世界上别的文化和价值。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价值可能是和平、自由、秩序,也可能是免于贫困和饥饿,要看一定时空条件下人们的考量和选择,而这与他们所处的当时当地的情境和具体条件密切相关。它也表明,处于不同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或不同情境下的社群,对价值或价值追求的排序可能不同,而这种不

① 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24页。

② 《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文明冲突”——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2版。



同是自然的、正常的,也是平等的。^①

毋庸讳言,上述不同的价值选择也会生成各种矛盾,甚而会因为矛盾的存在而彼此冲突。因为既然承认价值是多元且平等的,为解决这种矛盾背后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就必须“在共生中感悟自己如何存在,同时在共生中感悟他人如何存在,从而认真设计和精心选择与他人的共生之道”。^②换言之,认可价值多元与价值平等,为实现“多元共生”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而共生的前提是共存,共存的优化是共生。那么如何实现这一优化呢?中国提出的方案是“包容共进”,认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③

显而易见,“包容共进”强调的是在“异”中求“同”,在“同”中存“异”,通过平等协商、互联互通,努力将国际关系从传统对抗的治理结构向协商的治理结构进行优化,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恰恰在“包容共进”的过程中,共生的优化才开始从应然向实然状态迈进,且派生出一系列共存、共处、共生、共享的机制。即在推动公正合理的共生关系网络结构体系建设过程中,逐步打造遍布全球的公正合理伙伴关系网络结构体系,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平等协商、互联互通、包容共鉴、公正合理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循序渐进地推动共生从和平共处优化到和平共生,直至和谐共生。值得关注的是,这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维、多层次、复合性凝聚体系的过程。^④

可见,中国全球治理观以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发展方向,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强调在此过程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于这一认知,它具有三重意涵:

它首先体现了中国自身谨慎的态度。这意味着中国认识到国际秩序的转型虽然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一过程崎岖漫长,且要建立在各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

① 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20页。

②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3544页。

④ 金应忠:《论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逻辑原初性》,《国际观察》2017年第2期,第1页。



鉴的基础上;其次表明了中国是国际秩序转型的积极参与者、改革者和建设者的定位,一方面会与世界各国积极分享自身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会代表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但另一方面寻求的并非是“中华治下的和平”——谋求在世界上的霸主国家地位,主导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最后指明了国际机制的调整和改革的方向,在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上,不是一个霸主国替代另一个霸主国,而是要与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国际现实相契合,摆脱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束缚,在尊重制度差异和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顺应各国发展的现状与需要,构建全球共治新模式,塑造一种有别于传统国际政治理念的新理念。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全球治理观和中国方案能否顺应时代发展,符合时代需求是以能否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为前提的,而能否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只能依靠有效的实践加以检视。从十八大到现在的 6 年里,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无论是 APEC 北京会议开启亚太自贸区进程、杭州峰会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达沃斯年会上的《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主旨演讲、日内瓦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的演讲,还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及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埃博拉疫情和各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中国正通过一系列具体行动,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注入中国力量。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不仅是以中国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几年来的发展又推动了全球治理新实践的系统化发展。^①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立两个大的全球性贸易路径使沿线国家深化其与中国在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联系,推进彼此之间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进一步统筹中国大周边东—西和海—陆两个战略方向的平衡,打造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② 最为关键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蕴藏了深厚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启迪,打破了以传统霸主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及模式,强调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通、互学互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作用。它体现的

① 张春:《“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新实践》,《国际关系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99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0/29/c_1116983078.htm。



是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展现的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互联互通,推动的是全球治理机制朝“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方向前进。^①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②

三、中国全球治理观的价值特征

如果将中国全球治理观比喻成一幢宏伟建筑的话,首先是向外敞开的四扇大门——“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然后是支撑建筑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五根支柱分别是:1、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2、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3、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4、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5、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五根支柱共同打造一个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屋顶。^③最后是体现建筑风格的价值基础——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同其他国家实现共赢共享、和谐共生。而在实践中,可从战略构想、政治义理和政策方针这三个层次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价值特征进行阐释。

在战略构想上,中国全球治理观体现了“大”与“新”的有机结合。这里的“大”强调中国全球治理观已跳出了民族国家的藩篱和主权国家的窠臼,其精神内核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即主张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崇尚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在这种“大”的指导下,中国全球治理的目标绝不是所谓的“梦回汉唐”,重塑以中国为顶点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也不是如同传统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那样,建立所谓的“中华治下的和平”,而是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它要求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打造一个体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页。

② 王毅:《“一带一路”不是中方“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 <http://npc.people.com.cn/n/2015/0308/c14576-26656889.html>。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0~482、523~525页。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其展现的正是中国这个具有原创性古老文明国家把发展自己与发展人类文明和谐地统一起来的惠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和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创新是它的整体思维不仅超越了西方选举驱动的政党政治的局部和短期利益观,而且还具有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整体合力。而中国将现阶段世界发展大势和自身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交织一处,更是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汇合的全方位的战略发展愿景。它旨在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现象,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机会来享受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展现出中国向人类文明提出的一个永久性道德价值和终极关怀。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唯有如此,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与履行国际责任时,才能“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①

在政治义理上,中国全球治理观展现了“一”与“多”的辩证统一。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是“构建繁荣、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它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众所周知,由于相互依赖性的发展已经使得地球成为“地球村”,各国经济纽带连接的越发紧密,人员往来亦是愈加频繁。但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使得人类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已成为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的是一种整体利益优先的意识和相互关照的利益协调机制。即作为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个成员,必须认识到“大家庭”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如此,“大家庭”才能成为无论兴衰荣辱都休戚与共,将各自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大家庭”观念的出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提供了舞台,而后者则发挥了不断充实“大家庭”内涵和完善“大家庭”观念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共生性普遍主义的意涵,彰显了人类社会对“一”的诉求与愿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8~249 页。



景。

然而,现阶段国际社会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且各国的国家战略、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面对这种“多”的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坚持的原则是“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①其前提是认可国际社会实质上是多元共生的共生关系结构体系,即价值多元,强调“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要求任何国家或行为体的理念和行动必须契合多元共生全球性共生关系网络结构体系的存在与变化发展逻辑演绎需要,在充分发展各自主体性的同时不断拓展相互之间的多元共生性,以契合全球化发展逻辑演绎需要。如前所述,承认价值多元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要遵循价值平等的原则,即认可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总不忘强调主权原则的缘由。习近平指出,“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因此“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②

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才能始终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不但强调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还主张“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③换言之,它倡导的是以多元价值为本,并以国际共生方式激发出各种生机和发展的可能性。因为既然价值是平等的,差异也就不成为冲突之源;相反,在多元共生状态中,差异反倒是生命力的来源,共生意味着认可差异,尊重差异,在价值多元的情势下各主体自处、共处和共进,实现差异中的相生相长。

可见,这是一个强调建设性平衡的过程,其中存在着多种互动和往来,并通过这种互动和往来而推动“多”迈向“一”。它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或一方消灭另一方,

①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8/c_1114794507.htm。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3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0页。



而是在交往中学习、适应,共同探求对现状的改进和完善,逐步萌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育出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

在政策方针上,中国全球治理观实现了“义”与“利”的统筹兼顾。中国全球治理的目标诉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意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这三大严峻挑战,如何让发展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能够弥合是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绕不开的问题。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在推动公正合理的共生关系网络结构体系建设过程中,打造遍布全球的公正合理伙伴关系网络结构体系,推动构建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①

既然谈及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利益”是个绕不开的问题。那么,所谓利益究竟应做何指?它当然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唯利是图,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甚至是因一己私利制造地区矛盾。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目的是解决全球发展与分配不公,实现均衡发展,因此必须寻求彼此的利益融汇点。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在处理国家间利益方面,要倡导“正确义利观”,做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他还要求“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在国际关系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②

“义”其实也是“利”,但强调的是“兼济天下”的“计利当计天下利”,反映的是一种“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大国胸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追求的不是中国在大国俱乐部中争得怎样的一席之地,念兹在兹的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现实关怀,孜孜以求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古国致力破解各种全球治理难题的一剂“良方”。换言之,合作共赢也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罢,中国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均为一个目的服务,就是要致力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这就要求应践行正确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义利相兼,义重于利,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避免沿用传统的单边霸权方式追求本国利益,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

① 金应忠:《论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逻辑原初性》,《国际观察》2017年版第2期,第18页。

② 《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4/c_1111468087.htm。



利益,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倡导同舟共济和权责共担的精神,寻求与世界各国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破除零和游戏,促进国际关系的优化。^①

为此,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首先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并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众所周知,近现代国际关系往往出现结盟和对抗的组合模式,因为针对第三方的利益集团往往容易引发猜疑对抗的轮番升级,甚至还会导致集团之间“热”冲突和“冷”对抗。因此,“结伴不结盟”更加符合当今时代要求,更加灵活有效地推进国家之间、地区内外和专门领域的合作共赢,更加有力地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发展。^②现阶段,中国已经同9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未来还要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

其次,中国强调大国之间相处,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大国关系历来是国际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大国关系治理模式往往直接决定着国际秩序形态。^③中国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

最后,中国主张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基于此,中国致力于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④

概言之,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和贯彻,标志着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中国梦”与“世界梦”结合起来,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思想依据。

四、结 语

中国全球治理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

①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7页。

② 杨洁勉:《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国家特色和国际交汇》,《国际展望》2016年第1期,第116页。

③ 苏长和:《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3132页。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享”视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全球治理观已上升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是从中华文明基体论出发,以改革为方法,以公正价值为导向,结合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努力在将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相契合的基础上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呈现中国精彩的最新举措。

任何想法或构思要升华为思想,能够“行稳致远”,势必有价值的支撑和指导。简而言之,中国全球治理观在认可价值多元和价值平等的基础上,强调全球治理要实事求是,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而应坚持“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在合作共赢和互联互通中逐步实现共生的优化,逐步从和平共处升华至和平共生,最终实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它要求超越中心—边缘的传统窠臼,凝聚各方共识,促成集体行动,开拓一条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共同打造一个蕴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各方是利益共同体的参与者、责任共同体的贡献者,最终也将是命运共同体的获益者。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恰是这背后的价值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之故。

毋庸讳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与期许,也是共生优化的落实与目标,但更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因此,中国应同国际社会的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